

明人明事

——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



曹凌云◎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明人明事

——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

曹凌云◎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人明事——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曹凌云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ISBN 978-7-01-010397-6

I. ①明… II. ①曹… III. ①区(城市)—文化史—温州—明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8620 号

明 人 明 事

MING REN MING SHI

——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

曹凌云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8

字数:6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397-6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明代永嘉的风格(代序)

商 传

龙湾地处浙东,古之永嘉地也。自南宋永嘉学派之兴起,即名闻遐迩,盖其风格非仅坐而论道,而尤重于世功。

元明之际,太祖起兵,取金陵而下浙东,得诸先生,礼为贤士,以刘基独重,其后取天下多得其谋。当时天下士大夫历元明之易代,其风格史称元末明初之士风。以往学者论之,多以江南士大夫之风格为其代表,殊不知江南一带颇重声色,多杨维桢之俦,而浙东则重于世功,以刘基为其首,其迥异之作为,实为元末明初两种截然不同的士风代表。

入明后之永嘉,承元末明初浙东追求世功的风格,一时间人才辈出。前有成祖初建内阁之黄淮,后有世宗议礼入阁之张璁,永嘉一地,两朝阁老,于成祖、世宗两朝国是建树颇多,后世引为名相之楷模。成祖论淮称:“黄淮论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①璁以议礼骤贵,时人及后世臧否不一。而当世所修之《明世宗实录》以官史评之,称:“其署都察院不终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在内阁……,于是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又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②孚敬者,璁之御赐名。此为官方盖棺定论之说,璁当之而无愧矣!

明代永嘉,人才辈出,黄、张二阁老外,尚有王瓚及王澈、王激、王沛三兄弟,王叔果、王叔杲,画家郭文通、谢廷生,书法名家姜立纲,以棋奕而名的鲍一中、方日升、方日新,以儒医而名的袁宗乔,各种人才尽荟萃于此地。人们不禁要问:这又是一方何等不同寻常的水土,养育了如此众多的英才?

然细思之,刘基助太祖取天下,有开国立朝之功,自当不同于因循却进之辈;入明后两朝阁老,所辅者竟亦皆为入继之外藩,故二人均以辅导之功业著

① 《明史·黄淮传》。

②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明世宗实录》卷221。

于史册。立朝也罢,辅佐外藩也罢,总之是不同于旧时的传统的敢为。此岂浙东之风格?抑或温州之风格?抑或永嘉独有之风格?

我由此而想到,其实所谓永嘉风格,是在追求世功的过程中更具备了敢为天下先的反传统的精神!

永嘉倚山邻海,实非传统认识中的富庶之地,若无反传统之精神,又何得以世称人杰而地灵之处!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作《肇域志》,述及永嘉,引旧志云:“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漆而器用备,不宜粟而粳稻足。”若无反传统的风格,而因循于旧日的模式,又何尝能够在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上获取令人惊叹的收获呢?

顾氏于四百年前引述的这段文字,今日又重为永嘉传统的再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永嘉人又在种种的“不宜”之中,开创了今日多个天下第一的辉煌成就。

人类生活中最具传承力者即为文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基因的传承,虽经种种社会变迁仍然相伴始终而不会泯灭。今日永嘉,虽未必人人尽知数百年前先辈的作为,然其血脉之中,却仍然流淌着那务实与奋发求新的基因,成为今日成就永嘉奇迹的重要因素。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独具的地方优势,以成今日辉煌,这是永嘉人良苦的用心吧。

龙湾区委、区政府领导以其敏锐洞察力,有感于事业发展中,文化传承之重要,欲发掘永嘉文化传承的作用,特于2010年金秋之季,由龙湾区委宣传部、龙湾区文联等单位牵头在龙湾召开明代龙湾文化学术研讨会。一时海内外耆学云聚,共同挖掘并重温浙东之文化传统,弘扬地方历史之辉煌,弘扬永嘉精神,以更好为今天的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此实为泽被后世的功德之事。

明弘治修《温州府志》有云:“永嘉道德之乡,贤哲相踵,前辈虽往,风流犹存。”这既是对永嘉传统的总结,更是对永嘉后世的预见,当时还是明朝弘治的时代,其后数十年,便是明世宗以外藩入继皇位,伴随嘉靖的改元,永嘉张璁独排众议,赞成世宗反对传统制度的继统,而尊自己亲生父母的大礼议,并由此而进入内阁,成就了嘉靖朝前期的辉煌,也成就了一代名相张文忠公。

“前辈虽往,风流犹存”。每读至此,不能不令人抚卷感叹:今日的永嘉,不依然是风流仍存么!

庚寅岁末于京南陋舍

在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上的致词

张立文

我有幸参加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从代表参加会议的学者角度说,我们感谢会议的邀请,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学术、互相学习的平台;从龙湾是我的家乡角度说,她是生我、育我、成我的地方,她是我生命的资始点,也将是我生命的资终点。人的一生始终离不开家乡。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在我的家乡召开,我为龙湾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到骄傲,也为龙湾各级领导的睿智卓识感到欣慰。

我们突破物理的时空,从学术价值的时空来看,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可谓是一次“东风方来满眼春”的盛会,她为龙湾唤来学术的春天。龙湾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人文鼎盛的礼仪名乡,是一个英才辈出、代有传人、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地方。南宋状元赵建大,明代首辅张璁、侍讲王瓚,抗倭英雄王沛、王德,以及理学家王叔杲、项乔等等,都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丰功伟绩。或为社会改革而竭尽心力,或为抗击倭寇而英雄牺牲,或为民族事业而鞠躬尽瘁,或为革除弊端而不怕险阻。

今天,当我们缅怀前贤的时候,应传承他们优秀的传统。扬民族之精神,续中华之文脉,承优秀之道德,弘思想之精华。例如:

其一,不怕杀头,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创新是对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价值的一种突破和否定,必然会遭到坚持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价值者的攻击、仇视,以至扑杀。正德年间,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宦官刘瑾专政,藩王作乱,政治腐败,苛政如虎,民不聊生。王瓚(1462—1524)不畏强暴,暗讽刘瑾,而遭贬斥;武宗巡边犒军,劳民伤财,王氏知民疾苦,大胆极谏。

张璁(1475—1539)在“大礼议”之争中,依据《礼记·问丧》:“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人情是衡量新疏、嫌疑、异同、是非的标准。张璁基于此,以大

无畏的精神,无惧政治风云的险恶,对三朝元老杨廷和等要世宗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兴国大王,首发“异议”,词严气壮,不悚不慑。杨廷和以其首辅权威,定“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这对于一个刚中进士不久,无权、无势、无实职的观政礼部的张璁来说,无疑是鸡蛋碰石头的命运。当时刑部尚书赵鉴列张璁罪状上报皇帝,并阴谋“上若云是者,即扑杀之”。然而,张璁并不因有扑杀的危险而退缩,放弃自己的“异议”。“大礼议”之争,形式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之争,体现在政治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学术思想上是正统程朱理学与新兴阳明心学之争。张璁以阳明的心学反对程朱理学,这在政治上是一次大较量。凸显了一种敢于坚持原则,不怕扑杀,敢于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其二,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大丈夫精神。张璁24岁中举后,春风得意,次年(1499)便进京应礼部试,他满怀信心,跻身仕途。然而却名落孙山。温州地处山陬海隅,古来交通甚不方便,赴京应试,需经千山万水,路途艰苦,难以名状。自弘治十二年(1499)至正德十二(1517)年间,他七试七黜,七黜七试。在落第的巨大心理压力下,他毫不气馁,灰心丧气;他排除种种干扰和压力,立定志向,勇往直前;他以坚韧不拔的大丈夫精神,锐意进取,终于在正德十五年(1520)春二月礼部会试,榜上有名,这是张璁第八次参加会试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一个人只要立定了奋斗的目标,就要为实现人生价值目标而努力。在北京国子监的进士碑上,就有张璁的名字。

其三,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沿海倭寇猖獗,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沿海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南北朝战争中,南朝失败后的武士大多流为海盗,大肆走私、抢劫,为害人民,江、浙、闽、鲁、粤沿海都受其侵扰,故称为倭寇。龙湾永嘉场一带地处滨海,倭寇在此烧杀抢夺,张璁的外甥王沛(1485—1558)痛恨倭寇侵袭,他自动号召组织民众起来抗倭,后王沛的从侄王德(1517—1558)从广东按察使司佥事辞官回乡。王沛、王德叔侄捐出家产,招募乡勇2000余人,共同抗倭,取得多次胜利,永强义兵名扬浙南。他们不拿政府分文,自动自觉保家卫国。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大股侵扰永嘉场、梅头一带。当时王沛已74岁高龄,仍然亲临前敌,英勇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王德赴援温州府城,途中遭倭寇伏击。他在殉难前仍射杀数寇,牺牲时年仅42岁。这都充分体现了他们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龙湾人民树立了榜样。

其四,持身特廉,疾恶如仇的正义精神。张璁对贪官污吏刻削人民,甚为

痛恨。他曾上疏,指出地方官为贿赂京官,搜刮民财,以至捶挞诛求,小民怨声载道,“宜严加禁约,犯者勿赦”。张璁认为,贪墨成风,与内阁有关。若内阁贪脏,部院和地方就肆无忌惮了。因此,张璁入阁后认为,严革贪风,必须从内阁做起。他约会内阁成员,告诫他们要各修本职,以收治平之功。他严以律己,持身特廉。为杜绝贪风,澄清吏治,制定内阁禁约:各衙门事务,“议于公朝,不得谋于私室”,以断私下交易,收受贿赂;接待官员,“宜礼见公署”,以免请托私事、结党营私、假公济私;凡投私书、馈送财物,一律由缉事衙门访捕拿问;等等。张璁以身作则,使得贿赂公行、贪赃枉法之风有所收敛。

其五,排除万难,厉行改革的革新精神。明自“土木之变”后,社会危机逐渐加剧。王守仁认为,社会已到了沉痾积痿的“病革临绝之时”。为挽将要倾覆的明王朝,必须厉行改革。当时社会最突出的危机是社会贫富不均,土地兼并至极,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达60万,占总人口1/100。张璁为抑制土地兼并进一步恶化,把农民固定于土地上,便坚决清理庄田。当时土地兼并最严重,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因此,清理庄田就成为首务,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共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归还农民。这虽损害了藩王、勋戚、宦官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仇恨,但有益于社会的安定。

明代宦官专权乱政,武宗不理朝政,宦官在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掌握军政大权,形成全国统治网。他们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大臣,鱼肉人民;大肆搜刮,举国不宁。张璁入阁后一再上疏,请求坚决撤除镇守太监,使百年流毒,一旦顿除,四海生民,以此为乐。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明代东厂、锦衣卫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厂、卫与法司职权不分,越权审捕。张璁上疏,请求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凡贪官冤狱,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法司机构提问审明,不得擅权坏法。限制了厂、卫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此外,张璁还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他认为谥封孔子不过公、王,与世俗公、王无别。他上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来,溷乱至今,未有能正之者。今宜称先圣先师,而不称王,祀宇宜称庙,而不称殿”。这样便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于是孔子“名益尊”,“道益重”,隆师之礼亦更重视。

张璁每一项改革,都遭到攻击,数次致仕离京,只有“衣囊一篋”。徐阶当国,“出京之日,大车几百辆,弥月不辍”。相比之下,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璁两袖清风,为官廉正,人格崇高。

其六,严家风、勤耕读的尊师重道精神。王激曾任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

张璠建“罗峰书院”，教育弟子。王叔果致仕后修建学校，教育族子弟。王光经(1576—1626)以自己俸银，修葺书院，明礼乐，课文艺。他们都表示了重教的精神。王绍志(1878—1960)历任温州初级完全师范学堂教员、校长，改革校务，为时所重。王晓梅(1896—1968)曾任永强崇实小学教师，协助叶氏三兄弟(希禹、希黎、希贤)创办三希小学，任校长16年。其间对教材、教学法、管理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

在龙湾各姓的族约、祖训中，认为“国有政，家有训，众之纪也。”《英桥王氏族约》规定：“凡子孙居官，务要廉勤、正直、尽忠、体国、恪守官箴。”治行卓越，惠泽百姓的，歿后族谱传之，如果是贪酷被黜者，那么，在族谱上便削其爵。《双河村何家桥陈姓祖训》共29则，如孝父母、友兄弟、和夫妇、交朋友、笃宗族、重本业、尚勤俭、遵国法等。《东坛郑氏祖训十则》第九为“重学”，认为“四民之道，重在读书”。第十为“重农”，认为“衣食所赖，惟农力田”等。族约、祖训使龙湾人民得以提升道德情操，滋养尊师重道的精神。

这些优秀的精神，是龙湾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富有之谓大业”，精神的富有，才能真正成功大事业；“日新之谓盛德”，不断地创新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正由于龙湾有这样深厚文化底蕴，才使龙湾有今天的大发展。龙湾的文化底蕴是龙湾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文化是龙湾发展的根底。无文化根底的地方是很难持续发展的，也很难进入事业发展的高层次。龙湾文化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龙湾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礼让宽容、好学勤俭。龙湾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得益于龙湾精神；我自己也得益于龙湾精神的熏陶，才使我获得一些成就。我要感谢父老乡亲对我的培育大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会议主办单位领导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卓越睿智的洞见，由一个区来召开一个高规格的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从会议的前期筹备到今天会议周到的接待，精心安排，无一不凝结了主办单位每一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心血，我们再一次表示感谢。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对龙湾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定会产生深远影响，为温州文化大市的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目 录

明代永嘉的风格(代序)	商 传 1
在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上的致词	张立文 1
张璁入阁“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吗?	胡珠生 1
——四问《费宏集·前言》作者	
在历史与传说之间	邱国珍 12
——以何文渊传说为例	
张璁:明代 60 年改革的开启者	田 澍 25
试论张璁护救张延龄兄弟	林延清 34
彼文忠,此文忠:张璁兴革与张居正改革	吴琦 冯明 40
——对明代中后期政治改革再考察	
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	蔡克骄 55
——以温州龙湾王、项、张三族为例	
温州龙湾地区明代的著姓望族及其对社会经济	
文化之作用与影响述略	吴仁安 66
试论明代卫所军户的地方化	张卫中 85
——以永嘉场普门张氏、李浦王氏、环川王氏、 英桥王氏的通婚为例	
宋明宗法庶民化的历史形态 ... 朱新屋 裴氏清香(越南)100	
——以项乔的家族建设为例	

嘉靖永嘉英桥王氏宗族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周元雄 117
明代永嘉军灶籍进士与灶籍进士关系述论	饶伟新 126
宁村所 汤和 戚继光	范中义 140
王叔杲与永昌堡	陈学文 161
——明代民间自建抗倭城堡的历史意义	
明代温州地方海防的变迁与永昌堡的	
建置	王兴文 官凌海 168
——兼论海防事务中官民角色的转变	
大历史背景下永嘉场筑堡自守的必然性	高启新 178
寇乱、渔盐与明代中后期的温州社会	胡铨波 190
——以王叔果兄弟文集为中心	
温州英桥王氏：阳明学区域传播的微观样本	钱 明 202
明代中期永嘉之学述略	张如元 226
张璁的宗、统不同主张与程朱理学	林 济 243
张璁的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陆玉林 257
王瓚议礼及其影响	顾钟麟 267
项乔与广东儒者之论学	朱鸿林 277
论项乔“求放心之学”的理学思想	张永路 304
和合朱陆，承续事功	陈欣雨 314
——王叔果思想论述	
明代温州文化简述	洪振宁 326
——兼论永嘉场在明代温州文化中的地位	
明代永强士族对大罗山发展的作用	王学钊 352
楠溪与永嘉场联姻望族文化交流	徐逸龙 361
奇特个性：徐霞客雁荡、天台游的别样视角	蒋明宏 375
明代龙湾科举兴盛与文化发展	王日根 383

竹枝词所见明清以来温州的风俗	王振忠	390
侯一元年谱简编	陈瑞赞	426
项乔年谱订补	方长山	436
明人暗事:家族文献编纂中的政治隐情	张 侃	455
——以《张太师世家》为例		
张璠及其纂修之《温州府志》刍议	陈嘉顺	472
——兼与嘉靖池州等四府志比较		
万历《温州府志》的特点及价值	杨海燕	485
——兼论王光蕴史学思想		
张璠著作考	潘猛补	494
英桥王氏文献浅探	陈伟玲	507
姜立纲书《明宪宗皇帝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考	陈 佐	517
温州龙湾国安寺千佛石塔宋代铭文		
考释	鲁西奇 林昌丈	526
《岭南代答》和《诸蕃志》的特色及历史地位	叶哲明	547
从《王瓚集》略述明代二三事	林 枫	559
明代温州士人追寻祖籍地探析	刘正刚 李贝贝	566
明代墓志中永嘉场史料价值	孙建胜	587
拂去时间的尘埃 重现历史的温情(代后记)	曹凌云	596

张璁入阁“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吗？

——四问《费宏集·前言》作者

胡珠生

张立文教授在田澍主编的《张璁与嘉靖政治》一书“序”里说：“在张璁‘大礼议’的价值评价中，自明清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褒或贬，或是或非。”“特别是由于张（璁）、杨（廷和）两派在价值观念上的分野：一以王阳明心学为礼论思维主旨；一以程朱理学为礼论思维主旨，‘大礼议’的论争有了理论思维的支撑，便导致了‘大礼议’论争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就出现了非此即彼的状态”。杨派被嘉靖皇帝压服后，“心中的怨恨不敢向皇帝发泄，而只能倾泄在张璁等人身上，张璁也只能替嘉靖受过了”。“历史事件经一段时空冷却，价值理性渐渐化解了价值情绪，而显露出历史价值的一些真实方面，这就是《明史·张璁传》为什么较之前人价值评价较为理性的原因所在，也是李贽《张璁传》及其他学者较能公正对待的缘由。当然还有一些程朱理学家的继承者仍然继承杨廷和派的原有价值观，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段话入木三分地概括了对“大礼议”双方评论的演变过程。

随着“大礼议”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张宪文校注《张璁集》的出版，特别是从张璁到张居正的政治革新已成为历史学界主流共识，早先政敌所加的“佞臣”、“奸险”、“小人之尤”、“举朝恶其人”等诽谤之辞，也都失去表面的含义，而只能得到相反的理解。魏良弼说得好：“张罗山为相，当大察事竣，检篋中仅得葛四匹，余居谏院，三疏纠之，嗟嗟！此余少年时事，此今日视之，即三荐其贤亦不为过。”^①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2007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费宏集》，其点校者吴长庚和费正忠二先生在所撰“前言”中，为了表扬杨廷和的同党费

^① 姜淮：《岐海琐谈》卷2引“魏水洲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温州文献丛书》第1辑，蔡克骄校本：《岐海琐谈》，第33页。

宏,坚定地站在杨廷和派的立场,批评张璁等为“佞臣”^①,其举措为“奸谋”^②,而对“群臣执前代之礼”^③则加以阐述:“都从典礼纲常方面立论,颇引汉宋故事为据(杨廷和《请正纲常昭典礼疏》),依程颐言‘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谓所生为伯叔’,认为应当称孝宗为‘皇考’,称孝宗后皇太后张为圣母,武宗为皇兄,而称本生父母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别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以承献王后(毛澄《大礼议》)”。认为张璁之论“举朝无人赞同”^④。进而提到:第一,“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迎合帝意”^⑤。第二,“张璁等人利用大礼议迎合帝意,迫害群僚,以为一己进身之阶”^⑥。第三,“张璁、桂萼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内阁,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⑦。第四,“璁、萼之辈虽然得逞于一时,但留在历史上的却是千古骂名”^⑧。由于“前言”作者所依据的都是诬蔑不实之辞,特行一一申驳于下。

一、张璁首上《大礼议》是“迎合”吗

“大礼议”首先由浙江永嘉人张璁提出,“主事桂萼疏亦上,具如璁指”^⑨。“楚王荣、襄府枣阳王祐、给事中熊浚、兵部主事霍韬、同知马时中、监生何渊、巡检房浚,各论礼如张璁议。”^⑩张璁成为大礼议的领袖不是偶然的。盛行于南宋的永嘉学派以经制治法之学著称于世,永嘉之学集大成者叶适在其名著《习学记言序目》卷49《皇朝文鉴三》就批评程颐《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不合礼法:“当称‘侄嗣皇帝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按兄弟之子称侄,礼无所据;而本生子以其属言者,世俗之辞也;以太加于王,又不

①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②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5页。

③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1页。

④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2页。

⑤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1页。

⑥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5页。

⑦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21页。

⑧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23页。

⑨ 查继佐:《乘时诸臣列传·张孚敬传》,《明书》列传卷16,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21)《明书》,倪志云、刘天路点校本,第2453页。

⑩ 查继佐:《世宗肃皇帝》,《明书》帝纪卷12,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18)《明书》,倪志云、刘天路点校本,第243页。

经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父母不可没也；‘持大宗者降于小宗’，小宗不敢齐也，避父称亲，义固无当；舍父称伯，理将曷宜？以古人之意义礼，而以世俗之名制礼，可乎？夫立后与为人后，所后父与本生亲，皆至公大义所在，而非以私情臆说行于其间也。然则世俗无据之名，不可以制礼也决矣。”杨廷和等把程颐《濮议》作为权威依据，南宋叶适把它看做“私情臆说”。传承永嘉之学的张璁，精通三礼，善于援古证今，在叶适驳论的启发下，进一步发现“汉之哀帝、宋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尚为人后者也。”^①但世宗未曾过继孝宗为子，因而《濮议》完全不适用。这就使得张璁在礼制理论上有了坚定的信心。正德十六年四月，“未选进士张璁诣礼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殊。瓚故宣言于朝。廷和以其抗礼，嗾言官论瓚，调南京。”^②王瓚于当月三十日被劾改调，六月二十日致仕，受到很大打击。张璁没有沮丧，仍于七月初一上疏议大礼，“请考兴献王，伯孝宗”^③。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礼议未定，复进《大礼或问》“辨继统继嗣之异”。“廷和遂授旨出璁为南刑部主事，慰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礼相厄也？”^④对张璁威胁利诱。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并附席书、方献夫二疏，请求速发明诏，循名责实以定大礼议。二月十一日，杨廷和致仕。三月，张璁和桂萼、黄绾、黄宗明联疏奏请明父子大伦和继统大义，去“本生”之称。四月十一日奉召赴京，行至凤阳，得敕“不必来京”，遂和桂萼再次上疏极论两考（既考孝宗，并考兴献帝）之误。未几又奉召赴京集议，五月二十四日抵京师，朝臣侧目而视，给事中张璠等扬言要“扑杀”二人^⑤，正是“生死在于呼吸，身家危于旦夕”^⑥之时。桂萼惧不敢出，武定侯郭勋“奏其事，上夜召见璁曰：

① 《正典礼第一》，《张璁集奏疏》卷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温州文献丛书》第1辑，张宪文校注本，第19页。

② 查继佐：《经济诸臣列传上·杨廷和传》，《明书》列传卷11上，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20）《明书》，第1830页。

③ 查继佐：《世宗肃皇帝》，《明书》帝纪卷12，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18）《明书》，第243页。

④ 查继佐：《经济诸臣列传上·杨廷和传》，《明书》列传卷11上，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20）《明书》，第1830页。

⑤ 《明史》卷192《张璠传》：“璠等乃取廷臣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请治璁、萼之罪，且私相语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扑杀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10）《明史》，第538页《二十五史》每至四格，第一格。

⑥ 《再辞陈情》，《张璁集·奏疏》卷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温州文献丛书》第1辑，张宪文校注本，第104页。

祸福与尔共之。”^①以上情况表明,张璁是在饱受打击,甚至危及生命的不利条件下上疏、集议的,是为坚持表达礼学创见而奋斗的。其后《辞升翰林学士》五次、《辞免升(入内阁)职》三次,共辞十五次,乞休十次,对富贵利禄极为淡薄。参与议天子为后服、议郊祀、议禘礼均不合帝意,史称“慷慨任事,持议正直,虽屡蒙严责,而割切益坚。”^②这足以证实张璁首上《大礼议》,毫无希图利禄之意,“迎合”二字出于政敌的诬蔑。相反,费宏“颇测知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议,虽预名其间,不复为特疏”^③，“前言”还说“费宏在揣摩世宗的想法时已经清楚他的目的”^④,这才是有意“迎合”，加上多次收受贿赂,其人品远逊不合则去的杨廷和。“前言”替他辩护,反而欲盖弥彰。

二、张璁迫害群僚以为进身之阶吗

所谓“迫害群僚”及下文“残酷地迫害群臣”^⑤,指的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左顺门大哭,二百二十人系狱,杖死十八人的事件。^⑥其起因和经过,是群臣反对张璁等(“大礼议”被嘉靖帝接受并提升官职)日趋激烈,终于自食其果。情况如下:

张璁等于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奉召抵京后,“二三权奸大臣先行风示大小官员,俱不许”与张璁等往来,“且又浮言恐吓,必欲使”张璁等“变其初说,务相和同”,为此,张璁上疏“望皇上亲临便殿,集执政、礼官,许臣等各执证据典籍,以面折再诏之误、两考之非,以破奸权邪谋,以成圣明大孝。早赐臣等还任供职,实至愿也”。^⑦这表明张璁等并无非分妄想。但权臣们的强暴压

① (明)谈迁:《世宗嘉靖三年六月》,《国榷》卷53,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02页。

② 查继佐:《乘时诸臣列传·张孚敬传》,《明书》列传卷16,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21)《明书》,第2455、2456页。

③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3页引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

④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4页。

⑤ 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5页。

⑥ 《国榷》卷53作18人,见下文“卒杖下”。《名山集》卷33《开圣记上·睿宗献皇帝传》和《明书》列传卷4《同姓诸王列传·兴献王传》均作17人,缺“员外郎高平”;《世宗实录》卷41嘉靖三年七月癸未作16人,缺高平及“给事中张原”。

⑦ 《正典礼第六》,《张璁集·奏疏》卷1,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温州文献丛书》第1辑,张宪文校注本,第34页。

制行为激起嘉靖帝的反感，六月十三日（丙午），“进张璁、桂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侍读学士”^①十八日（辛亥），“吏部尚书乔宇奏寝璁等新命，刑部尚书赵璜再论，皆被诘。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等、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等，倡同官七十四人会劾璁、萼等，责对状，宥之。”^②二十二日（乙卯），“翰林修撰杨慎、张衍庆等三十六人奏：臣等所执，程颐、朱熹之说也，璁等所言，冷褒、段猷之余也，不能与之同列，乞罢。夺慎俸两月，余皆一月。”^③七月六日（己巳），吏部尚书乔宇致仕。十二日（乙亥），谕礼部：“改上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曰圣母章圣皇太后”。十四日（丁丑），兵部尚书秦金、右副都御史王时中、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诰敕吏部左侍郎贾詠、翰林学士丰熙等、太常寺卿汪举等、给事中张翀等、御史余翱等、吏部郎中余宽等、户部郎中黄待显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赵儒等、大理寺正毋德纯等、行人司正高节等“各言尊号不当去‘本生’字，疏入留中，大学士毛纪、石珪再疏，报闻”。十五日（戊寅），“群臣朝罢，以前疏未下，相率诣左顺门伏候，或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泪内徹。上斋居文华殿，再谕退，不从，上怒，命录诸臣名氏，其首事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下狱，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撼门大哭，群臣皆哭，上怒，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百三十四人于狱，四品以上及司务等皆待罪。”^④十六日（乙卯），“上圣母尊号册宝曰：章圣慈仁皇太后。”“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劾张璁等欺妄十三条。上以璁疏留中，安从知之？责对状，云：璁等传稿，且通政司副封在。上复责谁倡？云：与尚书

① （明）谈迁：《国榷》卷53，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02页。

② （明）谈迁：《国榷》卷53，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02页。

③ （明）谈迁：《国榷》卷53，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02页。

④ 《明书》列传卷4《同姓诸王列传·兴献王祐檉传》较详：“其日，群臣争者三百二十七人，而何孟春为之首，疏入，皆留中，戊寅（七月十五日）朝退，孟春语诸臣：‘尚如宪宗朝故事，跪哭文华殿，诸公勉之。’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矣，仗节廷诤，正在今日。’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御史王时柯等因遮留诸臣金水桥南，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尚书秦金、侍郎朱希周、都御史王时中等二十有三人，……凡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是时，上斋居文华殿，闻故，传谕曰：‘群臣休矣，事在朕。’群臣咸曰：‘得上旨乃退。’大学士毛纪、石珪因言：‘举朝臣工伏阙执谏，陛下奉天命临九有，当使众志大同，公论谐协，舍己从人，乃为上圣。’上曰：‘恭穆献皇帝神主且至，册祝已具，不可卒更，姑退待命。’诸臣伏不起，自朝及午。乃命录诸姓名，收系为首者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凡八人。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上大怒，遂命并收马理等百三十有四人，皆系之。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以卿佐，姑令待罪。”见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19）《明书》，第1375页。